



核心阅读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切中了当下我们党基层治理的痛点，“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已成为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的热切期盼。重温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认清形式主义真面目，从根子上破除形式主义顽疾，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毛泽东如何领导人民军队反对形式主义

□ 李晓辉 李明

形式主义是党和军队建设发展长期面临的顽疾，毛泽东历来反对只看表面不重实际的形式主义，并领导人民军队与形式主义顽疾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早在建军初期，毛泽东就把形式主义作为党内军内一种非常突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批判。井冈山斗争“八月失败”后，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当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给湘赣两省根据地斗争造成严重损失，“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在当时，由于军队成分和斗争环境等原因，当时的红军内部存在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红四军内一些同志不顾敌情严峻和红军弱小的实际情况，错误地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硬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只有4000多人，军队指导又需要集中而敏捷，再费力不讨好地设立军委，“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而“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对于有些人对红四军党内存在家长制的攻击，毛泽东指出，这“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形式主义不问工作上是否有效果，斗争上是否更有利，不从实际需要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

古田会议召开前夕，红四军围绕如何建军、如何实施党对军队领导的争论中，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概括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14个问题，其中就有反对形式主义的内容。他还分析了形式主义产生的来源，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

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是与小团体主义、流氓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东西。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时，把纠正党内的这些错误思想作为首要内容，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对不正确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非常注意在实际军事工作中反对和纠正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现象。为提高人民军队战斗技能，他多次指示人民军队要克服教育和训练中的形式主义。早在1932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红军“一切训练要注意实际的战斗教育和演习，彻底废除过去一切形式的非战斗的教育和训练”。解放战争前夕，他要求人民军队“必须进一步实现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人民军队开始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步伐，但党内军内也逐渐滋生了一些形式主义现象。1953年8月，中南军区党委向毛泽东报告了连队大量存在的“五多”问题，即临时任务多，会议多，指示文件多，向下面要的书面报告、表册统计多，连队组织形式多，认为这是各级机关部门不明了下情的一种通病，提倡从克服机关部门的主观、片面、急躁，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加以解决。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肯定了中南军区党委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批示“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

在1950年代轰轰烈烈学习苏军过程中，我军曾出现过一些形式地照搬苏军正规化经验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例如，学习苏军条令条例的问题，苏军的条令条例是苏军建军经验和教训的浓缩，但也存在着规定过细过严，首长自由裁量权大的缺陷，容易造成官兵关系的紧张和对立。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第一代“共同条令”是参照苏军条令编写的，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军历来讲求和谐的官兵关系，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苏军纪律条令这种单纯强调首长权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情况，容易导致滥用纪律刑罚，并不适合我军特点。再如，照搬苏军学习制度，军校每天学习9小时导致学员吃不消的问题，等等。鉴于全军在学习苏军正规化经验中存在的简单化、形式化现象，毛泽东领导全军及时进行了纠偏正向，1958年3月他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简单的形式化做法时说，“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强调立足我军实际，有选择有批判地学习苏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军开启了从本国国情军情实际出发、“以我为主”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道路，军队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绩。



士官队伍建设的改革与发展

□ 王成芬



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全面拉启士官制度改革大幕。

此次改革，取消了专业军士军衔称谓，并划定士官军衔为“三等六级”。明确士官区分专业技术士官和非专业技术士官；从服役期满满的义务兵中选取，或从军队院校毕业的士官学员中任命，也可以从非军事部门具有专业技能

的公民中直接招收；规定士官实行分级服役、逐级选取制度；建立全军统一的士官登记注册制度。这些制度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当时部队士官编配范围过窄、规模偏小，服役时间“一刀切”，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极大地改变了士官队伍的整体面貌。

2009年，着眼部队建设新需要和人才发展新形势，全面深化士官制度改革再次开启。改革对士官使用范围规模、激励机制、生活待遇、安置办法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完善。重新调整士官结构比例，增加高技术专业士官编制和中级士官数量，改进士官选拔办法，对士官身份进行注册认证，明确专业技术士官职业技能等级资格，高级士官选取实行专家评议制，实行士官有条件的全程退役制度，增设士官技能等级津贴等。这次改革进一步优化了士官队伍结构、理顺了士官发展关系、健全了士官成才机制，推动士官队伍向突出作用、提高素质、充满活力、稳定成熟而加速发展。

经过两次重大改革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士官选任、培养和使用机制逐步完善。士官选拔来源渠道拓展。直招士官和大学生士兵的大量加入，有效缓解了部队紧缺急需专业技能人才的压力，

同时也从入口上提高了士官队伍的整体能力素质。士官成长舞台广阔。数十万干部岗位改由士官担任，士官任职岗位拓展到司务长、代理排长、技术员等，成为基层工作骨干、部队建设中坚。士官培训途径多元。从建立分级培训体制到全面实施“先训后选”的资格培训，从一味依赖军队院校教育到形成士官学校为主体、教导队和训练团等部队训练机构为辅、军工企业地方厂家等社会资源多方参与，覆盖全军各技术兵种的士官教育培训体系，士官人才输出有了坚实保障。士官管理更加正规。士官日常管理、选取晋升、配备使用、奖励处分、退出现役等各项管理法规不断完善，起到了引领士官集中精力专心于增强岗位任职能力的现实效用。

在改革转型中纵深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大刀阔斧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人民军队全面转型重塑，强军兴军开启新征程。伴随着新一轮改革蹄疾步稳，士官队伍实战化、职业化、精准化的路线图愈加清晰。

建设实战化。新一轮改革立足士官备战打仗主体地位，精准对接未来战场加快士官人才培育。针对士官任职岗位和等级制定军事训练目标和任务，出台专门规定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持续抓实士官大练兵大比武，坚持岗位磨砺，放手大项任务锤炼，在全面落地训全训严训实要求中加速士官胜战能力升级，一支“打仗型”士官队伍加快生长。

发展职业化。与国防和军队改革持续发力相适应，一系列完善和深化士官队伍建设的配套政策陆续出台，我军士官职业化发展加速。如，继续调整士官

编制数量和结构比例，突出士官主体力量；推行士官长制度、士官参谋制度。这在我军人事管理上具有深层意义。既有利于为基层军官减负减压，缓解基层单位忙乱低效，又有利于推动士官能力素质转型，拓展发展空间，加快我军军事人员现代化进程。

管理精准化。改革强军越深入推进，士官队伍管理政策越精准精细，我军士官队伍正从粗放式发展走向精细化挖潜、高效盘活优化士官人才资源的发展大道。准确定位发展基线。面向新时代，我军士官队伍发展基线被清晰界定为：在部队建设中发挥“英勇作战的先锋作用、军事训练的标兵作用、专业技术的骨干作用、履职尽责的榜样作用、遵章守纪的表率作用、管理教育的助手作用、官兵关系的纽带作用、学习成才的导向作用”。这是对士官队伍的全面肯定和目标指引，也是对保留人才、提升士官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的有力回答。精准设计成长路线。加快按照士官不同岗位分类设定发展目标的步伐，实现士官队伍依岗选人、以能定岗、定岗考评。在技术类岗位士官中实施士官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制度，在管理类岗位士官中实施士官长、士官参谋制度；大幅增加“官改兵”岗位，紧盯主战关键岗位设计士官编制、使用范围，力推“工匠型”专业技能士官、“专家型”专业技术士官、“复合型”指挥管理士官等高素质士官人才，精准选配、精准调控、精准引导的力度明显加大。完善保障提升动力。出台多项务实举措，积极解决士官婚恋、看病、家属来队住房、探亲休假、手机使用等实际问题，扩大士官家属随军保障力度，从事医疗和科研岗位的士官享有岗位津贴补贴，各项奖励和表彰向基层作战部队倾斜。目前，士官队伍中已走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八一勋章”获得者、“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全军学习成才标兵”等殊荣的一批佼佼者。精细科学规范的管理措施，激励和吸引士官队伍以更大的担当贡献才智。



“能战方能止战”的战争观基础

□ 赵林 艾正松

振兴的生命线上来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和准备战争。

慎战。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慎战是重战的延伸。正因为战争关涉的利益极大，“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必须慎战，须从“安国全军”的战略高度来对待战争。维系推动持久和平是慎战的终极目的，必须慎重地处理引发战争的“星星之火”，遏制住战争的导火索。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到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利益不断拓展，遵从国家发展大战略，抓住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潜在、非潜在的军事挑战，要超越时间节点来把握局势变化，不受一时一势得失限制，时刻保持战略上的清醒，将其放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避免不必要的战。毕竟，在谋国家强盛、军队强大之际，战端不应轻启，也不该轻启。但慎战决不是怯战、畏战，更不是不能战。近代中国痛彻心扉的屈辱史早已昭示我们，虽然维护国家安全有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多个选项，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和最后选项。

备战。“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军队唯有加强备战，扎实做好战争准备，才能有备无患。历史早已证明，当一个国家的人们都认为离战争

越来越远时，战争却有可能越来越迫近。二战前夕，德国装甲集团军群司令官古德里安就装甲集群突破进行多次模拟战推演，而法国军队指挥员眼中无敌情、心中无忧患，还在幻想“仗打不起来”。两相对比，法国军队只能被动挨打，开战六周就全境崩溃。汉武帝利用“文景之治”以来出现的繁荣昌盛局面，把中国儒家、法家与兵家的思想融为一体，相辅为用，大力革新军政，不仅在铁兵器的改进与运用上下了很大功夫，而且扩大和建设骑兵，整顿京师南、北军，制定“武功爵”奖励战功，改变原来的防御战略，从而使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长期困扰的匈奴边患得以彻底解决。从一定意义上讲，遏制战争的力度取决于准备的程度，要想不让历史重演，就要把战争准备做得扎实、可靠、充分，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当前，在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中，战争形态正加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演变，智能战争、网电战、太空战等各种全新作战样式正扑面而来。唯有以战争即将到来的忧患意识，着眼世界军事发展前沿，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做好备战训练、体制编制、军事理论等各方面准备，方可“以虞待不虞”。

胜战。抓住机遇实现强军“胜战”，在任何情况下，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人民军队都是对敌人最有效的威

慑。当年清政府斥巨资购建了包括镇远、济远、经远等9艘“远”字号军舰，组成了亚洲规模最大且装备技术先进的北洋水师，可在中日甲午一战中几乎全平覆没。为何北洋舰队难以致远，不能制胜？究其原因有很多，留给后人的警示教训也是十分深刻。其中，仅靠装备技术上“仿效西法”取得些许成就，但“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自身战略筹划、战备操持、战术操演等均形同虚设、徒有声势。甲午殇思、殷鉴不远，国殇警世、史鉴励人。为此，在强军路上，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紧紧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关键，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坚持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培养一支具有战略素养、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科技素养的人才方阵，锻造一支能够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

